

洋縣文史資料選輯
(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洋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洋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洋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八月

目 录

一条红色交通线·····	王伯慈	(1)
清朝的科举情况经历概述·····		
·····	阎雨人遗稿	(13)
忆述洋县议会沿革概况·····		
·····	张余庆 <u>魏瑞吾</u>	(34)
解放前洋县参议会概况·····		
·····	李侃如遗稿	(41)
吴新田盗鼎·····	<u>阎雨人</u> 吴建昌	(47)
“汉中王”吴新田的罪恶·····		
·····	王伯协遗稿	(53)
洋县围城记·····	王一庵遗稿	(59)
洋县土地陈报和复查之经过·····		(66)
·····	王一庵遗稿	
洋县禁烟概况·····	张余庆	(70)

回忆国民党西北青年劳动营的情况……	
……………魏异珍	(78)
国立七中与省立洋县中学冲突见闻……	
……………魏瑞吾遗稿	(98)
国立七中与省立洋县中学打架事件略述	
……………刘文昭	(107)
《洋县周刊》始末……	张羽仙 (111)
“山大王”王敬甫……	吴建昌 <u>魏瑞吾</u> (114)
我所知道的王敬甫、王敬斋兄弟……	
……………周崇礼	(153)
回忆洋县民团剿办王敬甫的情况……	
……………阎永安口述 冯端整理	(174)
韩凤舞攻打王敬甫被俘亲历记……	
……………薛振藩口述 张余庆整理	(178)

一条红色交通线

王 伯 慈

一、提出任务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受敌人破坏，主要负责人杜衡叛变。其他负责同志在关中难以立足，大都转移到陕南。接着，刘顺元同志于是年十月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陕南与贾拓夫、张德生、汪锋等同志组成特委，恢复和加强陕西党的工作。因此，陕南特委在一段时间里归中央直接领导，它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临时省委的作用，不但是对陕南工作的领导，而且是对其他一些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

陕南特委领导责任的增强与扩大，迫切需要疏通特委与中央、特委与地方的联系渠道，以便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及时指导各地工

作。于是，特委便提出了建立红色交通线的任务。

二、接受任务

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间，学校放了暑假，特委叫我以团代表的身份去城、洋、佛边区开展工作，我去后在那里以铁冶河（现在的铁河乡）为中心，建立团组织和赤卫队，配合红二十九军游击第三大队进行武装斗争。

十月，我回到洋县县城汇报工作，恰巧这时洋县邮局招考信差。特委领导同志王克明、赵定太、席中瑶商量，让我去报考信差，以打进邮局，为党做好交通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参加了报考，幸未愧于党的希望。

记得当时报考者有四五十人，考的内容是：写个文书公函，回答些地理名词的位置。监考的是省局派来的巡视员，名叫康宁。考试后，边了一段时间，邮局通知我，考的不错，有录取可能，让我不要远离，等待结果。再过了几天，又告我：县邮局已确定录用，并将名单

上报省局，等待批复。十二月份，县邮局正式通知我到邮局报到，并叫我找了铺保（当时进邮局工作的人都要履行这一手续），开始上班工作。

去邮局前，王克明、席中瑶和我谈话，交嘱我党的具体任务。他们说：你的任务是把党中央从上海寄来的文件和外地党组织寄来的东西送到特委，并把特委的有关文件寄往中央和各地。这项工作十分重要，一定要严守秘密，保证安全，不能向任何人外泄。他们还告诉我党内邮件的特征和标志，叮咛我细心识别，准确传递，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最后还说，我的组织关系还在特委，有事与特委直接联系，受特委直接领导。

听了他们的谈话后，我既感到任务的重大和艰巨，又感到党对自己是高度信任的。心里盘算着如何坚定地、谨慎地做好这一工作，灵活机动地处理好各项具体事宜，完成这一任务。

三、工作情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去邮局上班后，就陆续从上海和其他地方寄来好多东西。计有报纸、刊物、书籍、信件等类。报纸，主要是《捷报》，象现在的省报那样大，为对开四版。其内容记有江西根据地反“围剿”的消息，也说到各地的革命活动。这种报纸二尺长的卷本邮寄，封得严严的，每卷约有百十份。刊物也是卷寄，五六本、十多本，为数不一。书籍多为包邮，表面看为线装石印，有《精忠说岳》、《薛仁贵征东》等旧小说。也有其他一些书籍。党的重要文件，一般密写在某本书中，或用密写方法写在这些线装书页的背面。信件也采取这种形式寄。

这些材料大都以党内秘定的包装书写款式为标志邮来，上款写“陕西省洋县[書]收”（即洋县“图书馆”的标志）。下款落“申”（即“上海中央”的标志）。

为了把这些邮件准确无误地转送给党的地

下组织。特委设立了机要科，并指定三个通讯员：刘仲夫、王萱、赵××，从我手里接送邮件。每次外地的邮件一到邮局，我先把有党内标志的邮件很快地挑出来，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保护起来，并即速送出城外，交通信员再送往特委机要科。

这些材料收到后，对各地的革命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捷报》送到特委后，机要科把它分给各地党内同志，也在当时三十八军的军部、警各司令部，及其所属驻地，以及第五师范、第五中学、汉中联中等教育单位，都张贴过这个《捷报》，鼓舞了各地革命群众的斗志。吓得敌人惶惶不安，草木皆兵，派人四处搜查。

敌人把搜查的重点放在了学校，国民党党部也多次派人检查邮件。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尽一切办法对付这些家伙。每次邮件一到，我急速查看，如有党内邮件即速拣出。并把上面的记号去掉，装到邮袋子里，藏到秘密地方，把其他邮件摆出来，让他们检查。就这样一次

又一次地度过了险关，使党的文件安全地送到了特委。一九三四年后半年，敌人的检查非常频繁，但从未出现任何事故。在以后的几年中也未发生失密和不安全的事情。据刘顺元同志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给汉中地委的信中回忆，中央局给汉中寄过许多文件、书信等，都是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寄来的。

陕南特委与中央的直接联系，一直保持到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之后。一九三五年初，红四方面军打下宁强、勉县。包围汉中，特委遂之分散转移。张德生同志跟着红四方面军走了，在此之前，刘顺元、汪锋同志因有其他任务秋天到上海去了。特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也都先后离开了汉中。

特委转移后，红四方面军也很快离开了汉中。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反动派到处捕人杀人，党的活动被迫处于更隐蔽状态，但是各地分散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这段时间里，我仍然留在汉中，未离开邮局，我们借助于渠道派人找组织关系。一九三六年，我们和三原中

学的党组织取得过暂短联系；又派刘仲夫同志出去找组织关系。得到了与阎揆要团党的指示，回来组织洋县临时县委，于是革命活动又逐渐复苏起来。是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学生呼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日报》等报刊，都通过组织关系，经西安及时寄到汉中，使党内同志和革命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第二年通过我在邮局的方便，向延安邮订了《新中华报》、《解放》杂志。进一步加强了党对陕南革命工作的思想指导。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杨永昶回汉中了解情况，准备恢复特委组织。杨先找到我，了解了不少情况，接着又找其他几位同志谈了话，是年底向省委汇报了情况。一九三八年，陕南特委恢复，由陈元方、董学源、余洪远等同志担任领导，从而疏通了和省委的直接联系的渠道。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其联系的邮件，也大都是通过我传递的，如《西北》杂志等等。是年十月，国民党派人准备捕我，洋县党的县委才指示我离开邮局，到省委转赴延安学习工作。

以后这条红色交通线的情况，我就知道了。

四、几点感想

从一九三三年冬接受任务到一九三八年秋离开邮局，我在洋县邮局做了五年的交通工作。回顾五年的历程，心情激动，感受深刻。这五年是我党的中心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变到抗日民族战争的关键时期，全国全省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路线和策略方针的变化，都影响着陕南特委及其革命工作的发展变化。

一九三三年夏，正当蒋介石策动第五次“围剿”之时，陕西省委被破坏了。革命据根形势的变化，陕西党领导重心的南移，都给陕南特委赋予了艰巨而重大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改善党的秘密工作，疏通红色交通渠道，加强与中央和各地的联系，取得对革命的正确领导，就成为摆在陕南特委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同时，从陕南党的组织状况来看，改善和加强秘密交通工作，更是具有深远和现实的意义。陕南消息闭塞，交通不便，如

之其他条件的限制，革命斗争的起潮晚于关中和陕北，一九三〇年特委正式成立后，陕南的革命形势虽有较快的发展，但由于党组织比较年轻，缺乏长期的实践锻炼和马列主义的素养，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往往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弱点。因此，如何结合实际斗争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事。

鉴于此，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陕南特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就提出了“组织部关于教育培训工作”的任务，陈述了“这里文件非常之少”，材料严重不足的困难，“希望省委供给我们些同志的基本问题的材料以及最近中央与省委的文件，尤其是苏维埃的一些材料”。但是，由于交通渠道没有疏通，省委不久就遭破坏，缺乏材料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党的领导重心转移到陕南后，特委才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便有以上我所承担的红色交通线的开辟。交通线开辟以后，中央和根据地的文件、材料和书

籍，不断地寄来陕南。党员干部的训练教育工作空前加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迅速展开。从一九三四年初开始，特委首先举办训练班，“把成份好经过实际斗争的同志分批进行训练”，接着一些基层组织也举办读书会、训练班。据这年三月特委上报中央的《三月份经费预算表》提供的数字可见，仅邮订书报及党内刊物和举办训练班两项预支，就占全部预算总额的百分之十八以上（见1934年2月20日溥泉写给中央的《陕南工作报告》）。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汉中各地抗捐税、杀豪绅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不论在南郑、在褒城、在洋县、在勉县，斗争一开始就有二三十人参加，青年农民真勇敢，他们常常十几把刀就把豪绅的头切下来……南郑、褒城的西南区三个月杀了四十多个村、区长”。“在这一斗争的影响下，党的组织是迅速地扩大着，工农赤卫队的组织也向四面八方地发展起来，杀豪绅有历史的“杜家湾”……整个村子赤化了”（见1934年5月24日“陕南特委给中央的报

告之一”)。

红色交通线开辟之后，随着教育训练工作的加强，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识别能力也有了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当时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委还收到中央的文件，结合陕南斗争的实际，学习讨论了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出了“改善秘密工作，改善领导方法，改善宣传鼓动工作方法”的决定，要求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组织群众进行斗争。从而纠正了过去曾出现过的一些“左”倾盲动的错误做法，为党的策略方针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从陕南地区作出一定的努力。

工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两年，是陕南地区形势最严酷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虽然特委已经转移，但陕南基层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交通联系工作仍在继续。这对后来特委的恢复以及汉中地区革命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回顾过去的革命年月，我为自己能给党尽点微薄之力而感到欣慰；看看今日四化建设的光明前景，身体虽衰而心里却感到年轻。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于陕西工学院

清朝的科举情况经历概述

阎 雨 人 遗稿

中国封建王朝时代甄拔人才，分为两个途径，一个是选举，一个是考试。除此之外还有荫补、军功、捐纳等，但这些进身途径，都不算是正途。

清朝入主中夏，取人途径，完全沿袭明制，在中国推行了二百多年，从未变更。余生于清代光绪十年（即公元1884），现年已臻八旬，曾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参加过小场考试，并且取得了一名秀才。又于宣统二年五月在北京参加过选举场合，还获得了一个六品文官职衔。为使后人知道封建王朝之科目情况，兹将自己之亲身经过途径和过程中一些见闻，仅就记忆所及，分述梗概如次：

一、回忆科目时代的真面貌